

杰瑞·福多的人生与哲学

——欧尼·勒炮教授访谈

[美] 欧尼·勒炮 刘小涛 何朝安

2017年11月29日,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杰瑞·福多在纽约的家里去世,终年82岁。

杰瑞·福多是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哲学和认知科学荣休教授。在英语国家,他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及21世纪初)一位有卓越影响的哲学家。根据一个题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心灵哲学家”的公开投票结果:杰瑞·福多得票数位列第一,超过丹尼尔·丹尼特、希拉里·普特南、戴维·查尔莫斯、唐纳德·戴维森、托马斯·内格尔、约翰·塞尔和诺姆·乔姆斯基等人。

2017年12月,杰瑞·福多的生前挚友欧尼·勒炮教授应邀到上海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三天紧张的学术会议之后,在12日晚闲暇的咖啡时间里,我们对勒炮教授做了简要访谈。一个意图是安抚他的悲伤;另一意图,也想借勒炮教授的口述,对分析哲学和认知科学发展史上的这一重要人物,多些更鲜活的了解,以补充点儿有历史兴味的细节。

一谈起福多,勒炮教授马上陷入了回忆和深深的悲伤之中,他用一贯清晰柔和而不乏机智的风格,一一回答了我们提出的若干问题。根据欧尼·勒炮教授访谈所述,辅以他撰写的纪念文字,我们拟就文字初稿。经勒炮教授修订后,现译为中文刊发,以纪念福多教授所做出的卓越学术贡献。(以下内容,刘小涛与何朝安分别简记为“刘”“何”。)

刘:亲爱的欧尼,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提议。很遗憾,福多的逝世是分析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巨大损失。我知道,福多和你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特别希望你向中国读者,谈谈你所了解的福多,以及他的哲学。

作者简介:欧尼·勒炮,美国罗格斯大学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小涛,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副教授;何朝安,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勒炮: 是的, 非常伤心。我们失去了福多。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

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福多的著述在中国越来越有影响, 特别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领域。不过, 不是所有人都对福多有很深入的了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先简单勾勒下他的职业生涯。

勒炮: 好的。关于这点, 你可以在罗格斯大学认知科学中心(RUCCS)的网站上获得想知道的信息。福多1935年生于纽约, 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 196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60年直到1986年, 他一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然后, 在纽约城市大学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 于1988年受聘于罗格斯大学。因为健康状况的原因, 2012年他从罗格斯大学退休。

我曾经多次表达过, 福多受聘于罗格斯大学, 是罗格斯大学哲学系想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系的一个标志。在罗格斯大学, 福多成立了罗格斯大学认知科学研究中心, 并马上为哲学系和中心吸引来了一些重要的哲学家, 包括芝农·派利夏恩(Zenon Pylyshyn), 欧尼斯特·索萨(Ernest Sosa)、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 等等。

何: 他和你共事二十多年, 你们一起合作组织研讨会, 还一起合作完成过一些著作和论文, 包括颇有影响的《整体论》一书。你对他自然是非常了解的, 你会怎样评价他的性格特点?

勒炮: 多年以来, 对我而言, 福多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兄长式的人物。而且, 没有人比他更有趣。身为一名专业哲学家, 他成功地将对最高标准的论证和清晰的承诺和从事哲学研究并证明一个人所相信的东西的那种纯粹的乐趣结合了起来。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针对内容广泛的主题写了一系列书和论文, 包括整体论、语义组合性、语境敏感性、词汇学、分析性、戴维森、奎恩, 甚至超赋值。

何: 当然还有许多非学术活动, 对吧?

勒炮: 当然。我们常常共进午餐、晚餐, 我们还一起看过好多歌剧。他努力带我慢慢加入他最喜欢的歌剧和航海活动。他客厅里的那个巨大的音箱总是大声播放着歌剧或者其他什么, 完全超过了林肯中心和大都会博物馆。他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对于我这样听着四季乐队、法兰基维里的音乐长大的, 对音乐很迟钝的人来说已经很容易接受了。但令他失望的是, 我并不喜欢莫扎特的喜剧歌剧。杰瑞很泄气, 直到有一天, 我们碰巧遇到大都会博物馆里《丑角》的排练, 他发现我泪流成河, 杰瑞说: “我都忘了你是南意大利人了!” 有一次, 我们开车好几个小时到坦格伍德去听费代里卡·冯·施塔德表演, 这是一个他很喜欢歌手。她唱的东西好像是赞美猫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喜欢做的。然而, 我拒绝参与杰瑞的第二大爱好——航海。多年来我一直告诉他, 我看着他的船就发晕, 虽然他试着帮我缓解, 我还是很抗拒。但是我还是到新泽西的码头和他碰面, 他用分享自己的海上冒险经历的方式来“款

待”我。千万不要让我继续谈这个！

刘：你和马修·斯通一起访问过中国几次，福多会和你一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之类的活动吗？

勒炮：会，我们多次一起出国，去过澳大利亚、英国、圣马力诺、瑞典、挪威。在挪威，他告诉他们的国家科学院，他们应该花点时间在自然选择之外的其他什么问题。当被问及是不是认为所有的生物学家都可能错了的时候，他回答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错了。这些都是 2008 年的事了。

后来，有一次我们被埃玛·博格邀请去雷丁大学，杰瑞不喜欢去很远的地方参加会议。但是我问他，如果我争取到去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私人观光，你要不要一起去，他答应了。因为他发现这对他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他不知道负责人是埃玛的父亲，于是我们得到了观光的时机。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他特别想带一件珍贵的小展品回家。

我们还多次一起在圣卢西亚和意大利度过寒假，一起参加过美国的研讨会和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会议。一次是 1992 年关于整体论的为期六周的研讨会，还有一次是 1993 年的规模更大的关于意义的形而上学的研讨会。还有不同的哲学实践协会和美国哲学协会的专题研讨会，包括两次和唐纳德·戴维森的会谈。有杰瑞相伴，我从未感觉到无聊，每一次都充满乐趣。虽然偶尔也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安全感。

何：那么，你和他之间的学术合作进行得怎样？

勒炮：就我们合作时的工作习惯而言，当我们开始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们似乎总不乏有待开展的课题），我们会每天在他的公寓碰面，然后花一天的时间来发泄对其他论点的不满。当杰瑞准备好坐到键盘面前打字时，他的猫（Greycat，后来被叫做詹姆士先生）常常会跑到键盘上，而我们就不得不进入杰瑞的暂停时间。这些事总是反复发生，非常有趣，尽管杰瑞有时候稍微有点过头了。但是他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是这样，从不针对任何人。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有资历的同事，他对大家总是很尊重，但又不乏以怀疑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大家。

刘：福多曾提出了一些引起重大争议的论题，比如思想语言假设（the LOT Hypothesis）、模块性论题、心灵的计算主义理论，福多是怎样将这些论题编进一个整体性的网络之中的？

勒炮：他是心灵的计算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这是唯一有希望的理论进路。根据福多为心灵的表征理论进行辩护的一个典型论证，这是受当代最好的科学理论支持的理论。这也反映了他的观点：哲学和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这个观点在哲学界已被广泛接受。

何：那么，表征理论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

勒炮: 根据杰瑞的想法,我们的心灵都装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实际上是对福多称之为思想语言的内在符码进行计算操作的序列。这种符码是具有因果力和语义力的被内在表征的符号序列。就如程序语言那样,这些符码的形状特征驱动着因果效力的实现。它们的形状属性采用了一种像程序语言那样的因果关系,同时它们还因为处于一定的头脑与世界的关系中而具有语义学特征。马的存在因果地导致马的内部符号得以殊型化,并且,其他东西同样可能偶然导致此殊型化,如泥泞的斑马。然而,如果马不能使相应的符号殊型化,那么泥泞的斑马也做不到,而这是那个符号意指马或者关涉马的缘故。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对思考者大脑里对心灵的内部计算架构起作用的心灵表征给出说明。

何: 在你看来,福多支持心灵计算理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勒炮: 他对心智的计算理论的辩护,不是出于一种将人作为机器看待的还原性诉求。福多想要证明像我们的常识心理学那样的观点,即我们的有目的的行为可以被我们的信念和欲望合理地解释:给定我们所相信和欲求的东西,我们的行为源于那些我们认为最能够保证我们的首要愿望得以实现的东西。这一想法在福多还是 MIT 的一位年轻教授时,完全不受待见。在心理学领域,行为主义由于关注可被测量的东西而占主导地位,而在哲学领域,维特根斯坦和赖尔循序渐进地发展了心灵是由一套隐藏在观点下的内在状态组成的这种观点。福多想为一种脱离二元论的关于心灵的新笛卡尔主义的观点提出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理由。福多的理智主义观点是一种对于心灵的表征理论,他认为人们依照意向心理学的似律(law-like)似概括那样,通过信念和欲望行动。如果这些概括是真的,并且控制我们的行动,这是因为它们依照计算心理学的法则执行,这是被福多称之为一种特殊科学的一部分,其中的法则基本适用于行动者。在计算心理学中,命题态度,比如信念和欲望,都是对命题的立场或态度,通过它命题可以被思想语言的句子表达出来。依据那些决定我们在彼此关系中的后续思想和行动的命题,作为计算关系的态度才得以定义。

刘: 根据他在心灵本质方面的大量工作,我们是否可以说福多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呢?

勒炮: 我不这么认为。与笛卡尔不同,福多是一个坚定的物理主义者。但与传统版本相比,他的版本更弱一些。更准确地说,他的版本是非还原的,不需要那种把特殊科学现象和背后的物理规律相联系的等价式桥接律。在《思想语言》的第一章,他的一个主张非常引人注目,他认为对“特殊科学”的塑造应当独立于深层次的物理理论。二者所认可的规则性的东西可能有出入。因此,心理学家可能将具有不同神经生理学属性的事件归入同一心理学类型,而神经生理学同样可能将具有不同心理学属性的事件归入同一神经学类型。

何：那么如何得到思想语言的命题呢？

勒炮：对福多来说，它们是由概念构成的，当它们被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原子，而这些简单概念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关于天赋的主张，即使对于像“门把手”这样的概念来说，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但是福多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论证，证明我们必须认定“已然有东西写于白板之上”，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可以进行思考。1998年的《概念》一书，记录了福多在牛津大学进行的 John Locke 讲座。在此书中，他指出，除非“门把手”这一概念的潜在形式已然在场，以运用于门把手之上而并不是其他东西之上，否则的话，包括门把手在内的与人交互的外在物本身绝无可能触发门把手这一概念。

刘：是的，他的概念天赋论明显受到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影响。而且，和乔姆斯基一样，他也对进化论有些抱怨。在后期的职业生涯里，福多花了大量精力去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观点究竟是怎样的？

勒炮：根据福多对于心灵的彻底唯物论的观点，以及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致力于打破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人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就如他的对手丹尼尔·丹尼特一样。

但是，福多见解独特，并不轻易顺从潮流。于是，2010年，他和马西莫·帕尔梅林-皮亚泰利共同出版了《达尔文错在哪里》(What Darwin Got Wrong)，这本书对自然选择理论、对进化论的解释力提出了质疑。后来这成为他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甚至遭到很多之前极为推崇福多的哲学家们的白眼。

福多的观点并不总是与他同时代的科学一致。作为反对联结主义心灵模型的一个先驱，他始终对脑科学，对脑神经科学中的 fMRI 发现抱有怀疑。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错了，但是他的质疑对于神经系统科学来说是一种健康的矫正。那些针对他对人类进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批评的大量的不满声音常常淹没了他所提出的观点的精妙之处。作为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他不会放弃进化论，他所要放弃的是像盲目的钟表匠那样的选择理论。出于他自身的习惯，他做了许多学术研究，并且非常了解达尔文的作品和信件。有一次他特别对我说，他认为如果说达尔文主义者为了什么而被选择，那他们是被选择成为不能够阅读的人。他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幽默感，即使他的名声受损。

何：哲学家常常抱怨自己的工作对科学家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对于福多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吗？

勒炮：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是，杰瑞·福多作为一个哲学家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他展示了这门学科如何对科学发挥重要的影响，作为一位心灵哲学家，他的工作产生了大量经验性的研究，因为心理学家们要寻找方法来证明或反驳他的心灵模块理论的一些方面，他的理论认为，心灵的架构是由一个思想的中

心系统构成的,后者接收各个知觉模块一系列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这本薄薄的书在1983年出版后成为了研究心灵如何工作的关键,并且引导了许多听觉、视知觉、语言心理学和语用学的发现。

刘: 还有哪些你觉得值得一提的关于福多的故事吗?

勒炮: 有太多讲不完的故事了,每一个对我来说都很珍贵,回忆起这些故事令我更加想念他。鉴于时间有限,我就给你们讲其中一件事吧。

1992年的时候,我们在华盛顿大学,就状态空间语义学和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进行了一次会谈。他像对其他会议那样,虽然不愿意去,但更多的是为帮我的忙,他还是去了。事实上,这是我想为我的朋友——已故的罗杰·吉布森——做的一点事。他一直在跟我抱怨说他不想去,也不想参加,这让我在回复保罗时有点无奈,他热切地期待着我们飞去一个坐满巴恩斯医院研究员的礼堂(这个地方对保罗的观点比对我们自己的更为友好)。保罗做了多媒体报告,以针对我们的三个批评结束。我当时很紧张,怕不能很好地回应。但是在听完第一个批评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给出一个回应,当时我感到了短暂的放松。听完第二个,也同样如此。但是到了第三个批评时,我感觉很尴尬,因为它技术性太强了,我没太听懂,也没办法给出什么回应。

何: 那么,你是怎样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勒炮: 当我准备站起来面对这一“丢脸”时刻时,杰瑞轻轻拉着我坐回到椅子上说:“我来接招。”我如释重负。他先回顾了保罗的前两个反驳意见,然后给出了和我准备给出的答案一样的回应。之后他开始说第三个了,我当时想“谢天谢地,他有答案”。但是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只剩下震惊了,他说:“保罗,对于你提出的第三个反驳意见,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我当时想,“天呐,我本来也想这么说的”!但是之后的话,我确实说不出,只有杰瑞能说得出。他说:“保罗,其实你也一样,你也不懂!”接下来的会谈中,他们两人争论不休。甚至直到我和杰瑞冲向走廊,着急去赶飞机之时,争论还没结束。

刘: 是的,这确实是典型的福多式幽默。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责任编辑:肖志珂)